

计划与社会变迁^{*}

[匈] 阿特纳·安娜玛丽亚 (Artner Annamária)

王文彬 郭 晶 译

每个解决问题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行动计划，而行动计划是建立在对特定情况和替代性解决方案的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越是综合性强的问题，计划就必须越周密。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的直接生产皆同此理，但若想管理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再生产，以满足人口广泛和不断变化的需求，计划就显得更加重要。

本文所遵循的逻辑是从一般性理论思考出发，进而深入探讨更具体和更具经验意义的问题。本文的具体脉络是：首先，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最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与计划的逻辑相矛盾，由此探讨计划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和局限性；其次，讨论计划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社会”^①中的作用，阐述这条“漫长道路”^②充满了困难，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这些困难，再说明它们在苏联和东欧的具体形式；再次，更加详细地描述计划在匈牙利这一东欧国家的兴衰，以及通过一个作为反例的“成功故事”，介绍中国最近的应急预案体系；最后，概述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

一、资本主义的计划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生产力是随着生产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发展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一过程一直受制于资本积累。由于公司的规模和复杂性不断增长，公司内部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对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即协调和计划）。20世纪初，列宁指出，计划的必要性源于大规模生产所用的现代技术。J. K. 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把这群具有技术和管理专业知识的群体称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 structure）。^③国家也根据其不断扩大的活动目标和范围发展了自己的技术结构阶层。

若要缓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减轻无政府状态下市场力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有害影响，宏观层面的计划，即国家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尽管国家干预和计划通常与社会主义政权有关，但它们在资本主义中也并非不存在。例如，19世纪末的德国、大萧条时期

* 本文原载于 *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2021, 49 (3-4), pp.403-420, 原文标题为“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本文已获得作者授予的翻译权。本文注释体例按原刊格式保留。

① E. Rozsnyai, *Forradalmi és ellenforradalmi Szovjetunió* (Revolutionary and contra-revolutionary Soviet Union), Budapest: Author's edition, 1996.

② S. Amin, *October 1917 Revolution, a Century Later*, Daraja Press, 2017.

③ J. K.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7.

(1929—1933年)的美国、二战后的许多西欧国家和它们的一些原殖民地,以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由强大的国家机构和全面的国家发展计划引领的。

为了解其中的原因,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一) 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竞争和等级制度

资本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特征,这不仅使其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也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社会形式。首先,它建立在社会阶层之间和内部为处理和分配生产所产生的附加值而进行的竞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把这种普遍和激烈的竞争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最早用这一表述来描述法治社会出现之前人类的自然状态。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结构属性是涵盖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等级制度,其方式类似于分形(fractal)的基本图案。^①整体竞争的结果是,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各级社会的所有部门和职能中产生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制度经常使所有行为者之间产生竞争,迫使他们为捍卫和提高自己地位而斗争。

最具决定性的等级关系是阶级结构,所有其他等级关系要么是原因,要么是结果,都与之相关:资本家阶级通过垄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统治工人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集中在附加值的分配和使用上。

各个阶级内部也有等级之分。一方面,在资本家阶级内部,有些是大资本,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统称为中小型企业——主要为国内市场生产,通常由本国资本家拥有。这些资本集团之间和内部普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阶层拥有有趣和高薪的工作;另一些人则属于努力工作但收入低的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他们的工作既艰苦又有危险,收入也不稳定。工人阶级的群体和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和工作场所内为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报酬而竞争。

虽然这种多层面的竞争有暴力的形式,比如战争、屠杀、恐怖主义等,但竞争通常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无论何种形式的竞争,其框架和手段都是由国家提供的。我们可以说,国家是增值竞争中最重要工具。国家通过其管辖权、警察、军队、社会服务和公共媒体制定游戏规则。因此,所有的资本集团都试图控制国家,其最高目标是获得对国家强大功能的独家处置权。

国家始终为统治阶级的普遍利益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统治者是资本家阶级。然而,由于资本家阶级也是分化的,实际的国家政策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把持国家的关键职位而有所不同。如果是最大的资本集团(即跨国公司)及其买办盟友,国家就会放松监管,避免直接干预,并让自由竞争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然而,如果是较小的国家资本集团掌权,国家就会深入干预经济,以帮助其新领主更接近租金来源,实现积累和增长。这种政策往往依赖于计划,并产生一些本土的发展,因为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利润将留在国内,直到本土资本的资金增长到足以在国外投资。这种制度可以对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一些保护措施(1997年金融危机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做法),但它们也可以将跨国公司的服务与本国资本家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的优惠待遇相结合(成熟全球化时代的典型做法)。

^① 分形是一种自相似形式。最著名的分形是以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命名的。自然界中存在着许多分形图案(例如,晶体、树叶、松果种子、宝塔花菜、河流或河口等)。

然而矛盾的是，如果这些政策是成功的，民族资本加强了，国内市场就会变得狭窄，国家干预对国内公司来说就会变得过于严格。

我们还应该牢记，无论哪个资产阶级集团把持政府，其目的都是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这就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国家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时，也经常采取专制措施和蛊惑人心的手段来瓦解和转移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① 资本主义倾向于一种更喜欢利用计划促进积累的法西斯主义，二战后，无论是处于中心的西班牙、希腊，还是处于外围的韩国、智利，其中爆发的许多右翼专政的事件都表明了这一点。

（二）计划能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吗？

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在新自由主义提出之前就意识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之间的固有矛盾。他认为国家权力的增加迟早会使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就产生了回归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清算私有资本这两种选择之争。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完全有可能只是作为通向某种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停靠点”^②。在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也称市场力量的使用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将其称为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的“战略退却”。^③ 一个经济体要么由基于国家所有权的宏观计划主导，要么由基于私人所有权的市场力量主导。因此，任何包含国家计划和市场关系要素的经济，要么是资本主义混合经济，要么是非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后一种情况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它只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非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特点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国家的控制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央计划指定了市场力量的领地，限制了私有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中，国家所有权的作用不大，利润动机优先于人口需求，情况正好相反：市场力量占主导地位，国家计划的范围受到私有积累需求的限制。二战后，国家计划对西欧重建是必要的。然而，西方的国家计划并没有涵盖整个经济。与东欧的全面计划不同，西方的计划本质上只是指示性的，因为私人公司统治着经济，无法强迫这些公司遵守国家的规定。1970年代的危机以及随后的新自由主义进程，进一步降低了国家计划的重要性：计划被去中心化，失去了其宏观层面的作用。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对整个社会经济再生产实行计划管理是不可能的。随着计划的弱化，福利国家也开始衰落，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民主转型的梦想成了一种幻想。

总而言之，计划是一种管理企业生产和国家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但利用程度不同，目标和前景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建立在通过对人和自然的剥削实现私人资本积累的自由之上，消费受到无限制的刺激，计划服从于自发的市场力量。在社会主义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并将这些需求从

^① A. Artner, "Can Capitalism be Truly Democratic?",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0, No.4, 2018, pp.793-809.【本文原作者系匈牙利人，其匈牙利语姓名是 Artner Annamária。在匈牙利语中，人名顺序为先姓后名，故作者的译名为“阿特纳·安娜玛丽亚”，后文涉及匈牙利人名翻译时均遵循其语言表达习惯。原作者发表文章时按英文期刊的规范将自己的姓名表述为“A. Artner”，此处是先名后姓的顺序。——译者注】

^② F. L.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9.

^③ V. I. Len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Tasks of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 Report to the Second All-Russia Congress of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 October 17, 1921,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1/oct/17.htm#fw01>.【本处译文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4—575页。——译者注】

个人愿望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对市场力量的控制使用，主要由中央计划管理。

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不能通过计划来改变，但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使用计划来实现。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真正的困难是在这之后才开始的。下一节将讨论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必须通过社会主义计划才能解决的种种困难。

二、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的困难

（一）理论思考——四个方面的困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①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虽然他们的预言没有成真——无产阶级革命在外围取得了胜利，最初是在苏联，现在是在中国——但他们正确地指出了革命必须面对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困难：为必需品，即稀缺性（scarcity），而斗争。最发达国家未来的革命也是如此，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发展出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力。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在外围还是在中心，都继承了资本主义的稀缺性。因此，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所有困难的根源在于，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国家担负着发展生产和满足人们需求的双重任务。

从历史上看，这个巨大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旨在建立无剥削的社会的第一批试验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不发达外围地区（如俄国、中国、古巴、东欧、越南、朝鲜、智利、委内瑞拉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列宁这样评价俄国。这些外围地区历史上遭受过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掠夺，在那里，“贫穷是普遍的”。因此，在资源稀缺、经济结构落后、技术过时、结构和区域严重失衡、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和贫困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外围国家踏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

所有革命都必须面对的第二类困难，即旧统治阶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硬性和“软性”攻击：革命胜利后的军事干预、资本外逃、切断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实行高科技封锁，进一步加剧了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的稀缺。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当前现实，还将对未来战胜或限制资本主义的革命尝试产生影响。

在认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用他的话说，“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为何必须伴以民主集中制形式的无产阶

① 必须指出，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注意到了世界体系的外围区中发展不平衡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

② K.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 “Part I: Feuerbach”, Marx/Engels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ch01a.htm>.【本处译文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译者注】

③ “Marx to J. Weydemeyer”, March 5, 1852, Marx/Engels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2/letters/52_03_05-ab.htm.【本处译文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9页。——译者注】

级民主予以解释（见下文）。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本专政的补充，并且必不可少，因为阶级斗争不会在政治权力的变化后消失，相反，它采取了新的、不太明显的形式——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三个困难。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解释的：“‘后资本主义’时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阶段，其特点是决定社会内部趋势的自由极（free poles）之间的永久冲突：地方资本主义（响应生产力发展所显示的需求）、社会主义（表达人民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愿望）和国家主义（根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由当局的自主性而产生，同时表达掌控国家的新阶层的愿望）。”^①

与此密切相关的第四个困难是在市场、中央计划和自治这“不可能的三位一体”中找到平衡。（1）价值规律（市场力量）在“漫长道路”上还能存在一段时间，而且为了消除固有的稀缺性，甚至必须扩大其作用范围，但（2）为了实现划时代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央计划是不可避免的，同时（3）必须鼓励人民的社会自治，因为它是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防止出现恢复资本主义的新官僚/技术官僚统治阶级的唯一保证。

因此，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些矛盾最终代表了资本主义过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未来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如果社会主义力量被打败了，资本主义就会卷土重来。这些困难和矛盾不仅仅是抽象的，而且确实实实在出现在日常实践中，需要采取行动。下一个部分将介绍在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失败的）过渡期间，上述困难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现。

（二）实际困难——苏联和东欧的案例

上述四个方面的困难以多种具体矛盾的形式出现在欧洲最初的转型社会中。这些矛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下文尝试将其条分缕析。

生产与消费：社会主义革命后，发展生产基地是首要任务。这需要广泛的（以劳动为基础的）发展：把劳动力从农业引向工业，实现以重工业（重型机械、钢铁工业）和能源为重点的工业化——“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②，以及把农业重组为大规模农场和合作社。此外，所有这些都必须尽快完成，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为劳动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些同步进行的、在特定情况下相互矛盾的任务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十年变得异常紧张。

技术需求与知识匮乏：向密集型（以技术为基础）发展的过渡更加困难，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很低。

依赖性与本国发展：发展不足会造成依赖性，而在维持依赖性的同时，却无法克服发展不足。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各国不得不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口投资品，并用它们能够生产的产品来支付这些投资品。为此，结构发展不是为了满足本国的社会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出口市场的需求，而大量的商品出口又减少了国内消费品的供应（比如二战前

^① S. Amin, *Maldevelopment: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1990, p. 72.

^② V. I. Lenin, “Our Foreign and Domestic Position and Party Tasks”, Speech Delivered to the Moscow Gubernia Conference of The R.C.P.(B.), November 21, 1920,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0/nov/21.htm>.【本处译文参阅《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译者注】

俄国的粮食出口)。

重工业与轻工业：虽然重工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型机械）应该被列为优先事项，但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则要求发展轻工业（消费品）。这种困境体现在多个方面。限于篇幅，略做阐述。首先，轻工业的发展离不开重工业。因此，如果稀缺资源被用于发展轻工业而损害了重工业，工业化项目就会失败。其次，如果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工资来促进消费，而不增加消费品的生产，那么通货膨胀率和投机率就会上升。最后，如果解决之道是增加进口商品，那么贸易平衡就会恶化，这将引起负债，增加对西方的依赖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正如在东欧发生的那样）。

艰苦劳动与停止剥削的必要性：为了迅速提高生产水平和效率，需要对生产者给予强有力的激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其殖民地和本国工人阶级的极端剥削实现了原始积累，这导致了低工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就业不安全感。任何承诺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事业都不能以这种方式实现。因此，仍然是那个问题，即如果没有失业的威胁，集体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也尚未发展起来，那么如何激励工人阶级全力以赴开展生产？在欧洲早期的过渡社会中，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和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的宣传都发挥过作用，但这些还不够。因而有必要借助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向个人激励机制“后退一步”^①。这使得个人积累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如1922—1928年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二战后，经济机制的改革也影响到工业。历史证明，必须控制价值规律作用范围的扩大，正如中国迄今所做的那样，否则就会出现苏联、东欧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

综上，我们从生产的角度探讨了过渡时期社会的矛盾。现在，让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矛盾。

社会主义教育和管理的必要性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缺乏：消除统治阶级的知识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此，东欧过渡社会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技能（他们人数不断增加，具有农业背景）。然而，在一开始，还缺少合适的教师。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在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他们受到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滋养，通常忠于旧制度。白领工人、国家和政党的官僚机构以及地方社区的行政部门也是如此。即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革命没有敌意，这些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追逐利益转而关注人民的需要。

先锋党内的民主与集中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自觉的和科学合理的，这就需要先锋党领导班子有理论准备。一方面，必须允许进行党内讨论，以便发现问题并制定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无限制的讨论也会妨碍决策。列宁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所谓民主集中制（讨论中的民主——行动中的集中制）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一矛盾，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效果不佳。

社会中的民主与集中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三个支柱上：（1）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2）人民的努力；（3）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为此，必须不断取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体力劳动者接受教育，脑力劳动者接受体力劳动，再加上自动化的发展），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各个层面的人们必须更多地参与社会任务的准备和执行。

^① V. I. Lenin, "Report o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Seventh Moscow Gubernia Conferenc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October 29, 1921,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1/oct/29.htm>. 【本处译文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第598页。——译者注】

在治理方面，集权化与去集权化的必要性：与上述情况密切相关的是，过渡性社会的国家和先锋党经常与过度集权化的问题作斗争。为了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实行中央集权，但同样重要的是让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这就需要实行分权。然而，权力下放可能会威胁社会建设的成功，因为它给眷恋旧制度提供了一个机会，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并使他们反对革命。

生活水平的提高滋生了个人主义：在“漫长道路”上，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然而矛盾的是，生活水平提高实现了之后可能会偏离最初的目标。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市场力量在其中的作用日益增长，通常会与个人主义心态的蔓延同时发生，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如果不通过加强共产主义意识和人民民主的实践来加以平衡，就会成为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力量的特洛伊木马。

帝国主义的行动：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从未放弃过以任何手段破坏共产主义试验的目标。它们拒绝与社会主义国家分享先进技术 [使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清单 (COCOM-list)]，阻碍共产主义的传播以及与苏联集团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数量的增加，甚至在必要时进行屠杀。它们利用积极的宣传（如自由欧洲电台）和特务活动来达到目的。如今，这些措施也被用来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基于先锋党完备的理论准备的中央计划，对于克服“漫长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是不可缺少的。下一节具体介绍匈牙利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再简略介绍中国的成功，对计划的实施进行例析。

三、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的中央计划

列宁强调，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计划是决定性因素。阿明对此解释道：“要想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取得进展，需要实施一种计划，逐渐替代市场对私有经济的管理。这种新型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使计划成为必然。”^① 由于这种改变社会的计划有多种任务，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技术上完美、经济上有效并能在“漫长道路”的一开始就实现社会化的计划。为此，一个计划只有在不断监测并根据新出现的困难进行修正时才能成功。这种监测是一项社会任务，必须由更多的劳动人民来完成。“此外，在这种社会计划（而不仅仅是经济计划）的逐步推进中，每个阶段都必须促进经济管理的逐步社会化，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断的情况下，加强工人本身对它的控制，让他们的权力取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权力。”^② 如果没有人民参与管理自己的共同生活，社会主义社会就无法长期生存。

在苏联，中央计划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的战争经济。第一个长期计划的目标是实现全俄电气化。在大约200名科学家的参与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 (State Commission for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 于1921年2月制订并提出了“十年计划”。此后不久，为了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必须回归市场经济，由此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8年，新经济政策终止，五年计划时代开始。前两个“五年计划”快速推进了工业化，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

① S. Amin, 2017, op. cit. p. 26.

② Ibid.

长，大大增加了工人的收入。二战结束后，1950年代，经济发展再次加速，但这一次的部分原因是之前那些年集体化农业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功。^①

尽管困难重重，苏联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其东欧盟国都遵循这种中央计划模式。鉴于以上所述，本节将讨论匈牙利的情况，通过这个经验性案例，说明更好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困难。

（一）一个失败的社会主义事业——匈牙利的案例

1. 开端

在被苏联红军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后，匈牙利获得了通过中央计划的方式摆脱资本主义的机会。

第一个“三年计划”是由匈牙利共产党制订的，于1947年8月启动，由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共同管理（1948年两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该计划旨在进行战后重建，并为苏维埃式“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在推出“三年计划”的同时，还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和国家计划部，但经济事务的真正权力由最高经济委员会（1945年12月成立）掌握。由于上述的双重目标（经济重建和社会重组），第一个“三年计划”时期是非常困难的，其结果也充满矛盾。该计划片面倾向于积累（而不是消费）和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以及伴随计划实施而来的日益严重的政治压迫，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②

尽管如此，“三年计划”无疑成功实现了其目标——它在2.5年内完成，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工业的增长速度比二战前最好的几年还要快。1949年，工业生产比1938年的水平高出28%，而重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多（66%）。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10%—12%，失业率几乎消失了，工薪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了雇员平均水平的90%。^③这是一个经济广泛发展的时期，原因是固定投资（机器、设备等）和员工数量的增加以及来自苏联的廉价原材料的供应。然而，随着人们向工业中心的转移，农村失去了大部分劳动力，加上技术落后，农业产出比1938年下降了15%。

195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目的是纠正前一个计划期内出现的不足之处。国家仍然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其他目标，如技术现代化、农业集体化和提高生活质量（18万套新房，增加家具、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等）也被列入计划中。^④然而，1948—1950年的国际政治事件（如北约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计划的修改和军费的增加，到1950年军费几乎占国民收入的20%，导致1951—1953年的“战争经济”。^⑤

① A. Erlich,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lan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in Max F. Millikan (ed.)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67, pp. 233–278.

② A. B. Göllner, “Foundations of Soviet Domination and Communist Political Power in Hungary: 1945–1950”, *Canadian-American Review of Hungarian Studies*, Vol.3, No.2, 1976, pp. 73–105.

③ S. Balogh, I. Birta, L. Izsák, S. Jakab, M. Korom, and P. Simon, *A magyar népi demokrácia története 1944–1962* (History of the Hungarian people's democracy 1944–1962), Budapest: Kossuth Kk., 1978, p. 171.

④ E. Gerő, *Harcban a szocialista népgazdaságért. Válogatott beszédek és cikkek 1944–1950* (Fighting for the socialist people's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and articles. 1944–1950), Budapest: Szikra, 1950; S. Balogh, G. Föglein, and S. Szakács (eds.), *Nehéz esztendőkrónikája 1949–1953. Dokumentumok* (A chronicle of difficult years. 1949–1953. Documents), Budapest: Gondolat Kk., 1986.

⑤ Balogh et al., 1978, op. cit., pp. 175–176.

2. 问题出现

与“三年计划”一样，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为消除历史上的发展不足状况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积累是巨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但同时也付出了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该计划被过度实施，工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他们的收入低于预期。1951年，该计划的目标甚至被提高。由于这个原因，加上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出身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纳吉·伊姆雷（Nagy Imre）成为总理，并在政治和经济管理方面发起了变革。1954年，纳吉制定了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和治理的综合方案，其目的是改变发展结构，使轻工业和农业优先于重工业，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减速农业集体化，恢复小规模的家庭农业，等等。虽然这个改革方案没有完成，但它的许多概念，包括新创造的“经济机制”的说法，在1960年代及以后被用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①

同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层并没有改变 [马蒂亚斯·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仍然是第一书记]，这导致了一种双重领导。结果，接下来的三年是一个混乱和不稳定的时期——工业生产和实际工资下降、住宅建设放缓、住房短缺加剧、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的商业债务上升、农业集体化停止，以及合作社的数量减少。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加剧，各派别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政府的崩溃和党内团结的削弱使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领导，使许多人退出劳动人民党。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政策（例如，拒绝向匈牙利提供新的信贷）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政府决定通过强迫出口和减少进口来降低债务，这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

虽然情况从1955年年底开始有了一些改善，但这些年（1953—1955年）没有计划和可靠的领导，人们感到失望和不满，导致社会主义的内部和外部敌人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先是为了更好的社会主义，然后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这些事件导致了政府的更迭和共产党的改组 [其名称改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成为总书记]，1957年经济政策也因此做了一些修改。

3. 启动新的路线

经济路线在第二个“三年计划”（1958—1960年）中发生了改变：尽管重工业仍然占据突出位置，但提高生活水平（住房、实际工资、消费品）却被放在了首位——这是由纳吉在1953年提出的。1959年的党代会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应该不断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②此外，生产的效率得到了激发，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独立性得到了扩大，使他们在决定如何利用额外的（即超出计划的）生产收益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遵从了生产多样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它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制药和化学工业的投资，并通过将工厂设在靠近原材料开采地的地方来分散工业生产。另一个目标是以一种更自愿、渐进和分散的方式加速农业的集体化。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合作社的组织受到了“软手段”（soft means）的激励。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富有成

^① M. J. Rainer, “The Development of Imre Nagy as a Politician and a Thinker”,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6, No.3, 1997, pp. 263-277.

^② Balogh et al., 1978, op. cit.; T. I. Berend, *A szocialista gazdaság fejlődése Magyarországon 1945-1968*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in Hungary 1945-1968), Budapest: Kossuth Kk., 1974.

效的。1962年，96%的耕地由合作社或国营农场耕种，98%的工业生产和96%的国民收入是由社会主义部门生产的。^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现在可以开始了——正如其国家领导人所希望和宣布的那样。

对于这个里程碑事件，似乎有必要强调三点：

第一，要达到这个阶段（完成经济的国有化/集体化），需要16年，即半代人的时间。

第二，尽管“50年代”（1948—1956年）是政治压迫、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和共产党领导人犯错的年代，但没有那些年取得的成就，工业发展和生产资料社会化不可能达到1962年的水平。

第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改革进程以指数级速度前进。改革的根源是纳吉于1953—1955年的改革。这一进程从1968年开始加速，当时引入了所谓的“新经济机制”。其目标是增强市场力量的影响，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但“改革”实际上削弱了中央计划。所有这些都为废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做了铺垫。

尽管存在顽固的结构上的张力，但直到1960年代中期，广泛的经济发展仍在继续，这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国家区域一体化框架内的国际合作[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由于粗放式发展的基础——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已经耗尽，向集约式发展转变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②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上，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项结构性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能力的现代化，满足了人口迅速增长的需求（例如，公共汽车生产和出口的增加使得汽车供应量不断增加，用于农业和工业的化学品和塑料供应不断增加，计算机的发展，等等）。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于迅速扩大的生产，政府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特别是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中加速其发展。因此，城市交通得到改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以及超市的数量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得到提高。^③与此同时，1968年启动的市场化改革继续进行，并逐渐改变了人口的经济管理和精神风貌。

4. 释放市场力量

1970年代末，匈牙利的社会转型走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加强中央计划，让工人阶级和农民更多地参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要么释放市场力量，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党的领导层犹豫不决。这种犹豫部分来自卡达尔·亚诺什对1956年事件重演的恐惧，部分来自苏联集团的全面去斯大林化进程。恢复中央计划似乎就像苏联在1930年代从新经济政策转向中央集权和镇压一样，后者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的讲话以来，一直被声讨为“斯大林主义”。为了避免这种结局，需要实现政治和生产的民主化。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并且受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党无法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导致了“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僵局，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现代化，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民民主政权。这个过程逐渐损害了计划的权威性。社会主义远景似乎已经丧失了，这象征性地体现为：没有制订长期（15—20年）的计划，尽管计划局的一些专家一直在敦促。

^① Balogh et al., 1978, op. cit.

^② T. I. Berend, *A szocialista gazdaság fejlődése Magyarországon 1945–1975*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in Hungary 1945–1975), Budapest: Kossuth Kk, 1979.

^③ K. Lóránt, *Gazdasági fejlődésünk kritikus kérdései 1968–1988* (Crucial questions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8–1988), Budapest: MSZMP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e, 1989.

由于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加强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赤字的增加，匈牙利的外债开始飙升。为了缓和这种局面，1982 年，匈牙利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在事后才通知苏联，可见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领导层中渗透的程度之深。虽然“五年计划”一直持续到 1989 年的剧变，但它们的作用受到制度性限制，期待已久的结构改革也被推迟了。1980 年代，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加速了对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侵蚀。

5. 结果

1958—1978 年，匈牙利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在三个支柱上：（1）基于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关国家内部分工的工业政策；（2）基于大型和小型农业（合作社 / 国家农场和家庭农场）共生的成功农业；（3）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基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的技术发展。直到 1970 年代末，这种模式在经济现代化和满足人口需求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无法应对科技革命的挑战。尽管这种失败可以用一套非常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来解释，但这一切的核心原因无疑在于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中央计划的作用遭到削弱。无法从资本主义中心实现有效的独立就是源于这个错误。

萨米尔·阿明提醒我们，“断裂”或“脱钩”是实现本国发展和打开社会主义大门的第一个基本步骤。^① 错过这种“脱钩”就会扼杀社会主义前景。匈牙利就像苏联一样，在“漫长道路”上逐渐掉头。党的领导层未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尽管这是唯一可以挑战国家和党的官僚结构的特权、遏制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力量。由于一方面不敢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对抗反共倾向，另一方面在治理（包括计划）中扩大人民民主遭受挫折，党的领导层向反社会主义势力妥协，越来越依赖价值规律——这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

（二）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项目——中国的案例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跃升为全球大国，使这个纪念日变得真正具有意义。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所有因素，仅以中国共产党对新冠疫情极其成功的处理方式为例来说明其政策。

2020 年 1 月，在发现新型肺炎疾病后仅 23 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就对受疫情影响的地区颁布了全面封锁和限制令，并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让民众全面参与，以减少传播。^② 这些措施在两个月内阻止了病毒的传播，并在 2020 年 8 月（8 个月内）就能够消除大流行病。当时，中国的死亡人数不到 5 000 人。

这些措施的成功清楚地表明，民众信任他们的领导人。这种信任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行动。政府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它有一个结构完善、全面、中央集权的应急预案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国家预案。^③ 该体系基于“一案三制”，即预案是建立在法制、体制、机制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各级政府和行为者都有自己的应急

① S. Amin,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Zed Books, 1985.

② T. L. Xu, M. Y. Ao, X. Zhou, et al., “China’s Practic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OVID-19 in the Context of Large Population Movement”, *Infectious Diseases of Poverty*, 2020, Vol. 9, No.115, <https://doi.org/10.1186/s40249-020-00716-0>.

③ Zhe Wang, Emily Y. Y. Chan, Kevin Sida Liu, and May P. S. Yeung, *The Disaster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Oxford University and CUHK for Disaster and Medic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CCOUC),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licy Brief, May 2016, <https://www.hkjedpri.org.hk/download/policy/PolicyBriefDisasterandEmergMxSysinChina.pdf>.

预案：最上面的是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下面有专项预案（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接下来是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单位的下级预案。

此外，针对突发事件，中国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自基层非政府组织、慈善和地方社区组织、私营企业和公众的强大社会支持，向一线人员提供宝贵的支援，极大地提高了灾害管理的效率。^①

在资本主义世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现象。上述应急处理体系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它建立在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务实的、集中化的治理之上，以人民的利益为指导，并得到群众的支持。

四、结语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外围国家取得胜利。由于发展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之前，这些国家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在中央计划的帮助下，才能克服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同时，中央计划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参与之上的。

即使在发达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也将由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的遗产）、中央集权（通过计划管理社会变迁）和自治形式的人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的保障）之间的斗争来铺平。市场力量在道路的开始阶段是被需要的，但必须由国家有计划的和由民主方式制定的行动方案来控制 and 逐渐消除，然后应该逐渐被人民民主所取代。

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存在巨大的困境、多方面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而且无法保证成功。巧妙地利用国内资源，强化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提高组织效率，改善社会服务水平，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参与决策过程，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友好分工也是如此。但所有这些，特别是在这一进程的最初阶段，都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有完备理论准备的领导层来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而专政只针对陈旧的、剥削性的、个人主义的、自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眷恋的代表。

作者系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与区域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任弥尔顿·弗里曼大学教授

第一译者系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第二译者系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Zhe Wang, Emily Y.Y. Chan, Kevin Sida Liu, and May P.S. Yeung, *The Disaster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